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

《回望》 金宇澄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茅奖得主金宇澄新书《回望》出版—— 回望父辈的年代，让历史触手可及

凭借《繁花》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，作家金宇澄修订出版了文集《洗牌年代》，回顾了自己的年轻时代；而在最近出版的《回望》中，金宇澄要讲讲父辈的故事。



金宇澄父亲(二十八岁,《时事新报》记者)与母亲(二十岁,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)在太湖留影,1947年4月7日。

三个人的不同记忆讲述同一段父辈故事

《回望》里对父辈的回忆，并不是金宇澄一次有计划的写作。上世纪90年代，金宇澄曾借“伯父伯母”的视角写过一篇关于父母亲的文章，到2013年他的父亲去世，又以第一人称改动了原文，最后发表于2014年的《生活月刊》，题为《一切已归平静》。这篇文章也是《回望》的第一章。在文章中，金宇澄讲到自己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，而这批“老革命”在1949年后的经历让人唏嘘。《一切已归平静》篇幅不长，关于父母的故事并未展开来写，当《收获》杂志主编李小林看到此文后，希望金宇澄能继续这个题材。金宇澄在《回望》的最后写道，“李老师的热情，让我想起2002年去故乡黎里匆匆记下的那些片段。以后的几个月，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，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，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，如何应对他的时代，历经血与牺牲，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，面对选择，从青年直到晚年……”最

终，这些关于故乡和父母的回忆写成了《火鸟——时光对照录》，刊于2015年第五期的《收获》杂志。收入在《回望》里的这篇长文，又添加了他父亲的大量书信、读书笔记、同时期历史资料，就构成了该书的第二部分《黎里·维德·黎里》。而《回望》的第三部分则是金宇澄母亲的“口述实录”，以上海姑娘姚志新的视角来写。父亲去世后，金宇澄经常陪母亲翻看老相册，“旧影纷繁，总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，直至有一天，我请她以这些照片为序，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。她认真做了起来，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近90岁的老人，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，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，她变得沉静多了，仿佛只有回望，才是生命的价值”。金宇澄几次提议母亲整理成书，母亲却一直犹豫，“是给自家孩子们看的，是个人的私事”。于是，金宇澄以口述实录的形式整理了关于母亲的故事，这也是一个上海普通女孩的时光之变。

回望是为了留取样本

金宇澄曾这样解释写作的初衷：“记忆与印象，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，在静然生发的同时，也迅速脱落和枯萎，随风消失，在这一点上说，如果我们回望，留取样本，是有意义的。”《繁花》里描写的是当代上海的一地鸡毛、一盘碎片的俗世生活，作者对生活的态度，是一种隔岸观花的姿态，笔调冷，情感冷，透着无尽的苍凉。《回望》里，金宇澄的措词语调也企图冷静叙述，但是透过字里行间，仍可以窥见作者内心的炽热情感。他打开一段历史，让里面的往事带着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气息与情感，奔涌而来，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。由于不同的视角、不同的资料来源，书中内容和细节间皆相互对照，有补充、引证，甚至有冲突，这些不一致之处，被作者刻意保留下来，有非虚构写作的某种特殊意味。比如父亲与“堂兄”的情报工作关系及二人被押入狱的细节，两人都有不同的解释；年轻时代母亲登上火车投奔革命，被家人拉回去关了一个月，只有在属于母亲的一章里，才有了更生动的演绎……作者

保留了这些局部的不一致，保留了“言说与记忆”的交错状态，保存了“在场感”和“寻找”的姿态。曾在日本人的监狱中死里逃生的父亲，经历了血与牺牲，之后又接受了错综复杂的境遇。1967年时金宇澄十五岁，他问当时四十八岁的父亲——当年为什么不作码头工人？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去拉黄包车？如果这样，家里肯定不会多次被抄，就是安稳的“无产阶级”“工人阶级”成分了……那个早晨，父亲穿着带有补丁的中山装，戴了袖套，正准备出门赶去某学校——他已在那个地方扫厕所半年。他定然看看儿子，长久沉默后说：“我读的书还是少，爸爸的局限性……”这情景印在少年金宇澄心中。金宇澄在书末提到了热爱文学的父亲在《日瓦戈医生》白页上写的话：“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？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。”他觉得父亲的这些字是为他写的，父亲一直对他的写作和以后的编辑职业忧心忡忡。或许此书，正是一个作家对父辈的回应。

【书摘】一切已归平静 金宇澄

母亲说，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，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、一个旧柚木小圆台，请店家刨平了台面，上漆，木纹很漂亮。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，柚木圆台一直在家，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。一九九〇年，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，样式相同，三张叠在一起。他走进店堂，穿过旧家具的夹弄，看这三张暗褐色色的桌子。店老板一般很“识相”，注重来客年龄，打扮、神色，不讲话。父亲想打听什么，但是没做声，最后怏怏出来，在这一刻，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。“一定是日本租界的東西。”他对母亲说。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，这位昔日的抗日战士，已失去敏锐谈锋，即使面对他熟悉的“地下党”电视剧，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，不知是不是睡着了。记得有一次，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：“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？白皮鞋？”母亲耳聋，不习惯听器，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《中国老年》杂志，看一眼屏幕，没明白他的疑问。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，他的话越来越少了。他曾是上海“沦陷”期的中共情报人员，常年西装革履，也经常身无分文，为失业苦恼。“穿不起西装，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，配背心、皮鞋，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，弄得不好，过去就叫‘洋装瘪三’。”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，每提起深恶痛绝，“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”。或许，那是我母亲讲的，五十年前，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做番茄酱的原因。出事那年，因“日共”某组织在东京暴露，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。某个深夜，父亲与他“堂兄”——他的单线联系人，几乎同时被捕。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，“堂兄”突破车门跳车，摔成重伤。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，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。他记住“堂兄”摔得血肉模糊的脸，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，不明“堂兄”近况，本埠不认识其他人，无任何社会关系。金华是国民党地区，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，但不会说金华方言，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。翌日，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，“堂兄”已奄奄一息，只微微捏了他的手。两天后，“堂兄”在医院去世。随后的一年，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。日占时期，这座“远东第一大狱”仍以设计精良著称，整幢建筑通风通声，稍有异常响动，几层楼都听得清。新犯进门循照英制，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，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。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，每餐一小碗。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，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，不可活动。四周极为静寂，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，钟摆一样规则。次年，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。一年后，解至杭州监狱。两地都属汪伪管辖，等于嘈杂的菜市场，杭州监狱更甚，克扣口粮，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，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。监室走廊里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，也卖小笼、春卷、蛋炒饭、大肉面以及“包饭作”摊档，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，付了账，或一个银假牙，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，“片儿川”或几个菜肉包，狱卒听之任之。一人在牢里吃，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，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。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，趾高气扬进监，出手阔绰，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，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，叫热毛巾揩面，终因缺少社会资助，懂得讨价还价，然后锱铢必较，数零钱吃馄饨面，吃廉价盖浇饭，最后无钱可拿，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，没有接济，坐吃山空，最终饥寒而亡，死时蓬头垢面，仅穿了一套底衫裤，如缩毙街头的乞丐。附近监室，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、美籍男女，基本失去西人风度，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，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，不久都饿死了，没人管。这期间，他患重症伤寒、败血症、肺病、关节炎，头发大把脱落。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，多方搭救，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，保外就医。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。他的年轻和活力，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，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。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，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、地地斯咖啡馆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。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，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。一群青年人开怀畅饮，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，高声谈笑，无所顾忌。陶醉中走进西区，已是子夜了，只见附近绿树丛中某一幢大洋房，通体灯光雪亮，门窗大开，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，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，进入这所大房子。满地狼藉，宅主显然已逃匿，猫狗全无踪影，凌乱的大房间里有几箱洋酒，众人打开箱盖，人手一瓶，巨大枝形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，于是歌唱起来，声震屋宇，一直闹到东方既白，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上铺的波斯地毯上。等下午醒来，这幢折中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，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。



金宇澄近照